

中国各省人口格局发生新变化

在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2022年各省人口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截至目前，除宁夏、西藏外，全国31个省份中已有29个省份公布2022年人口情况。

从已公布的数据看，广东、山东、河南的常住人口总量分列前三的格局未变，29个省份中有17个省份常住人口数量实现正增长，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省份为浙江(37万人)；广东的出生人口最多(105.2万人)，也是唯一一个出生人口超百万的省份；有19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河南、山东、甘肃、安徽、北京、云南、陕西等7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22年首次转负。

17个常住人口数量正增长的省份中，江苏、湖北、安徽、山西、重庆、甘肃、内蒙古、云南、陕西、四川等10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浙江，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仅为0.04%，这反映了去年大部分常住人口数量增长的省份主要依靠机械增长，即人口流入。

“我国整体上处于极低生育水平和进入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人口迁移流动对一个省份、一个地区人口总量变动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对记者表示。

人口总量前三格局未变，浙江常住人口增量最多

从已公布数据的29个省份看，广东、山东、河南分别以12656.8万人、10162.79万人、9872万人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列前三名，广东、山东也是仅有的两个常住人口数量破亿的省份。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山东、河南分列人口总量前三的格局自2010年以来未发生改变。不过，去年这三个大省的常住人口数量较2021年均有所下降，且广东、山东是多年来常住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广东省统计局撰文指出，2022年，广东省外流动人口减少69.2万人，这是在2022年广东疫情散发多发的因素影响下，省外流动人口暂时回流返乡的阶段性现象。据运营商手机信令大数据显示，2023年1月返乡的跨省流动人口，2月已有84%回流广东。

与广东不同，山东常住人口减少主要原因是自然减少，记者计算发现，去年山东人口机械增长为正，人口自然减少达9.45万人。

从常住人口增量看，29个省份中，实现正增长的有17个，增量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浙江(37万人)、安徽、湖北(均为14万人)、江西(10.58万人)、江苏、广西(均为10万人)，除浙江和江苏外，其余4个省份均来自中西部地区。任远认为，作为人口流动主要目的地的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的常住人口数量仍然在继续增长，中西部地区常住人口数量增加很大程度上受到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

需注意的是，浙江在2021年也是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省份(72万人)，从两年的数据计算，浙江常住人口增长主要来自机械增长，以2022年为例，浙江人口净流入为36.74万人。

相比之下，12个省份常住人口出现下降，辽宁、河北、吉林、广东、黑龙江等5个省份减少数量超过20万人，除广东外，其余4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双双为负。

广东出生人口数量最多，贵州人口出生率最高

29个省份中，除天津外，均公布了出生人口相关数据。从出生人口数量看，广东(105.2万人)、河南(73.3万人)、山东(68.22万人)分列生育大省前三名，其中，广东依然保持第一，也是唯一一个出生人口超百万的省份，广东自2018年超越山东成为第一生育大省后，已连续多年出生人口位居全国首位。

河南、山东都曾是“最敢生”的省份，统计年鉴显示，两个省份曾多年每年出生人口数在100万人以上，不过，转折点都发生在2020年，彼时，两省份出生人口双双跌破100万人，且截至去年持续下降。从数据看，山东出生人口伴随着“二孩”政策实施而变化，2016年山东出生人口从上年的124万人飙升至

177万人，2017年继续维持175万人的高位，不过，随着“二孩生育势能基本释放”，2018年其出生人口较大幅下跌至133万人，随后逐年下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生育大省广东出生人口数量近年也在下滑，其近年来出生人口高峰在2017年(151.63万人)，随后两年维持在143万人左右，2020年下降幅度较大，降至129.08万人，2022年逼近100万的“关卡”。

从出生率看，与2021年相比，多数省份去年的出生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贵州、青海人口出生率突破10‰大关，分别为11.03‰和10.6‰，分列28个省份中第一、第二，此外，海南、广西、甘肃、广东、云南、河南、陕西、江西、安徽、福建也超过6.77‰的全国平均水平。不过，贵州、青海等出生率较高的省份，由于其人口基数比较小，对全

国人口大盘的支撑作用并不突出。

7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人口迁移对总量变动影响更大

29个省份中，有19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天津未公布该数值)，河南、山东、甘肃、安徽、北京、云南、陕西等7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22年首次转负。与2021年相比，人口自然负增长的省份数量进一步增加。

“有一些省份人口自然负增长已长期存在，实际上我国人口自然负增长是与长期的低生育率相联系的。”任远说，因此，完善生育和家庭政策，加强生育的配套支持，是我国人口政策需要继续加强的内容。

另一方面，在人口自然负增长加深的情况下，机械增长对一个地区的人口总量增长的带动作用愈发明显。

从17个常住人口正增长的省份看，江苏、湖北、安徽、山西、重庆、甘肃、内蒙古、云南、陕西、四川等10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同时，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浙江，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仅为0.04%。

“人口迁移流动对一个省份、一个地区的人口总量变动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特大城市，仍然是人口迁移流动的中心。这些地区的人口总量在整个国家人口负增长背景之下，依然保持持续增长。对某一个省份而言，有可能这个省份总体上人口处于负增长，但该省的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是人口迁移流动的集聚地区，继续保持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长。”任远说，因此，对这些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等福利政策改革，需要加以重视和不断完善。

本报综合消息

多地出台育儿补贴政策

一孩家庭是否应该纳入补贴?



近期，多地出台育儿补贴政策。如4月12日，《哈尔滨市育儿补贴发放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挂网公开，哈尔滨拟对符合条件的二孩家庭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三孩及以上家庭每月发放1000元育儿补贴，发放至孩子满3周岁止。

沈阳市卫健委等部门也于4月11日出台了《沈阳市发放三孩育儿补贴实施方案(试行)》，沈阳将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每月发放500元三孩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止。

据报道，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后，各地陆续比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出台地方性“实施方案”，育儿补贴正成为地方政府为支持生育而采取的普惠性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四川省攀枝花市、山东省济南市、甘肃省临泽县、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黑龙江省、云南省等10多个行政区，明确或正在制定育儿补贴政策。

育儿补贴一类的公共政策在部分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取得明显效果。但补贴范围、补贴力度等具体举措的不同，将对政策效果造成影响。

首先，如何看待育儿补贴的孩次差异?

目前，哈尔滨、济南等大多数城市集中在二孩、三孩家庭，少数城市如深圳、温州在征求意见中均将一孩家庭纳入。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对媒体分析，从实际的生育情况来看，三孩数量本来就少，占比很低。年轻群体对生育一孩的愿望本身都不太强烈，因此鼓励生育工作的重点应该从一孩生育开始。一孩生育才是“基本盘”，发放生育补贴，鼓励生育应该不分孩次，才能达到巩固“基本盘”的作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提交了《关于重视一孩生育支持的建议》，呼吁“重视一孩”。贺丹分析，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一孩生育率下降将进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剧生育水平下降趋势。

其次，育儿补贴对鼓励生育的效果如何?

2021年7月，攀枝花在全国率先推出为生二孩、三孩的户籍家庭发放育儿补贴金政策，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到孩子3岁。2022年10月，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唐忠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政策实施一年来，全市出生人口数量较政策实施前一年增长了1.62%，其中，能够直接体现政策实施效果的二孩出

生增长了5.58%；三孩出生增长了168.40%。育儿补贴金政策推行期间，群众的生育积极性有所提高，政策实施初步显示成效。

对育儿补贴，各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民众声音方面，2022年初，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制作了《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调查问卷》开展调查，这份问卷设置的问题中有一项为“假设政府每个月给生二孩/三孩补贴1000元(自出生后至3岁)，您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三孩?”对此，不少网友在评论区提到补贴力度不大，连奶粉钱都不够，1000元对养育成本来说是杯水车薪。

在学者角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系主任杨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单一的育儿补贴政策很难达到鼓励生育的作用，还需要托育服务、家庭津贴等等一系列组合拳一起发力，才能使政策效果更为明显。目前许多地方在探索各自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如何需要3年才能显现。

进一步看，生育补贴政策普惠性如何?同等生育情况下(比如都是三孩)，城市里哪些人可以享受、哪些人不能享受?

当下，多地生育支持政策仅适用于城市里的一部分人群，例如沈阳的三孩育儿补贴仅限本地户籍。然而，据《人口与经济》(2022年第6期)刊发的一项研究论文《孩子养育成本与福利补偿：基于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视角》，流动人口家庭

由于无法享受当地福利，育儿成本比普通家庭更高。可考虑对流动人口应当给予更高的补贴力度，促进城市基本福利普及。

除了流动人口，生育支持政策需关注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相对其他家庭，低收入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限制，从而抑制生育。《人口学刊》(2021年第6期)中的《国外生育支持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一文显示：许多国家的生育激励政策都注重从低收入家庭入手，英国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确保生育补助金”，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获得一次性500英镑的经济支持。美国对于低收入家庭和单亲家庭提供了一系列生育支持，包括生育现金补贴、托育服务、就业培训等。

育儿补贴政策自2021年攀枝花首推以来，已在目前推进了近2年时间，补贴力度、补贴形式、补贴范围等细节仍需不断完善。如何将政策惠及到更多的人群?这需要兼顾城乡，重点关注低收入人群和流动人口。比如从实践可行性上考虑，可否首先将常住人口纳入补贴范围?

并且，现金补助的模式在短期内可能起到直接的效果，但长远来看，也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生育意愿仍需将现金补助政策与完善托育服务体系、产假制度等系列举措组合实施，从根本上构建生育支持政策环境、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更是长久之计。

本报综合消息